

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档案文献选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 央 档 案 馆



中共党史出版社

THE NEW

AMERICAN

REPUBLICAN

OF

THE

NEW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档案文献选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 央 档 案 馆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098-2425-2

I. ①中…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中共三大(1923)—档案资料—汇编
IV. ①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9602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鹏

复 审:高秀清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210mm×295mm 1/16

字 数:236 千字

印 张:9.5

印 数:1—900 册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425-2

定 价:59.00 元(精装)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编纂委员会

主 任 欧阳淞 曲青山 杨冬权
副主任 龙新民 李忠杰 段东升 李明华

主 编 李忠杰 段东升
副主编 霍海丹 许卿卿 李 蓉 赵云云

执行主编 刘宋斌 许卿卿 赵云云
执行副主编 覃 艺 贺德海 李 颖 许 虹

编 辑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刚	王志刚	王树林	王继凯	王淑芳	石 勇
田 伟	毕 岚	闫永雪	刘 扬	刘宋斌	刘淑珍
刘慧娟	孙 力	汤 涛	杨 青	杨津征	李 颖
李莉娜	陈小梅	郎迎洁	契文峰	姚金果	徐玉凤
殷月兰	常建宏	梁惠荣	董婷婷	覃 艺	魏雪莲等

编辑说明

1. 本书档案文献,主要选自中央档案馆的馆藏、已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俄罗斯档案馆公布的有关档案、国内外已公开的有关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录等。

2. 本书选用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文献或选用出版物内容,均注明出处。

3. 本书档案文献,均使用国家统一颁行的简化字排印,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范围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照排。订正文字错漏等,一律用符号标出。错字改正用〔〕号,漏字填补用〈〉号,衍字改正用[]号,辨认不清的字以□号代,缺字以△号代。

4. 编入本书的档案文献标题,一般照原题刊印。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由编者代拟或修订标题,在此一并说明。已经公开发表、出版的档案文献,则采用公开发表、出版时的标题。

5. 编入本书的档案文献,若只选用原文的部分内容,一律在标题后注明“(节录)”,文内不再使用删节号。

6. 编入本书的档案文献的年代、月份的标注,有些不够规范,编辑时作了必要的处理。

7. 对个别档案文献的时间、作者以及原文意思不清楚之处,编辑时进行了初步考证,并加注说明。人名不全或容易引起歧义的,一般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加注说明。

8. 本书档案文献中的人名、地名,统一按现在通用的写法、译法排印。

编 者

2013年11月



目 录

一、中共三大文件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三年六月）	陈独秀	3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一九二三年六月）		5
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三年六月）		9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一九二三年六月）		10
劳动运动议决案（一九二三年六月）		11
农民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三年六月）		12
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一九二三年六月）		13
青年运动决议案（一九二三年六月）		14
妇女运动决议案（一九二三年六月）		14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一九二三年六月）		15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一九二三年六月）		17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六月）		20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致日本共产党的信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九日）	21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致印尼共产党的信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九日）	22

二、中共三大相关文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建立共产国际东方部符拉迪沃斯托克局	
的决定（不晚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日）	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日）	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2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	
（一九二三年三月三日）	28
维经斯基致斯内夫利特的信（一九二三年三月九日）	29
旅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对于第二次全国大会的意见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日）	30
维经斯基致斯内夫利特的信（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32
第三国际妇女部告中国女学生书（一九二三年）	34
关于罢工问题的讨论记录（一九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35
斯内夫利特致拉夫斯坦的信（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	36
吴佩孚与国民党（一九二三年五月九日）	孙 铎 38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	
（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马 林 40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	
——关于中国形势和 1923 年 5 月 15 日至 31 日期间的工作报告	
（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一九二三年五月)	44
斯内夫利特致布哈林的信(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46
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之间)	48
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之间)	52
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孙 铎 57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马 林 59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马 林 64
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的信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马 林 65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同志致孙中山的信	66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关于中国形势和6月12日—7月15日的工作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	马 林 67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时局的宣言(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六日)	70
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日)	马 林 72
致廖仲恺的信(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马 林 74
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一九二三年七月)	孙 铎 77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 (载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先驱》第二十四号)	8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84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86
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中央局迁沪后更动(一九二三年九月十日)	87
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张国焘 8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93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前锋》第二期）	陈独秀 95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国民党改组及收回海关主权问题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01

三、中共三大有关回忆资料

杨章甫给梁复然的信（节录）（一九六七年）	105
梁复然的回忆（节录）（一九七二年五月）	105
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七一年）	张国焘 106
中国回忆录（1921—1927）（节录）（一九七五年）	C. A. 达林 115
关于共产国际四大和中共三大情况的回忆（一九七九年四月）	刘仁静 118
关于三大前后的回忆（一九七九年十月）	于树德 120
回忆《向导》的出版发行情况（一九七九年）	徐梅坤 123
回忆中共三大（一九八〇年三月）	徐梅坤 125
回忆中共三大（一九八〇年二月）	罗章龙 128

附 录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	139
中共三大会址考	洪 霓 140

一、中共三大文件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三年六月）

陈独秀

现在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上届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太少，搜集不了很多材料。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材料也遗失了，所以概述得不可能全面。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人，因此，代表会议以后，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名委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当上海的迫害更加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善机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的局势也不稳定，因此，改善中央机构还是不可能的。

上海和广州小组由这两个市的一些地方小组组成。北京、汉口和长沙（湖南）的许多地方小组已联合成地区小组。郑州小组在京汉铁路罢工时被破坏了。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我们只能提出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的材料落到了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由于一个同志被捕，这些材料全部遗失了。

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还有十个同志被关在狱中。

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

杭州会议以后，我们间断地出版了日报^[1]，这种间断的情况是罢工造成的。报纸只出了二十八期，每期平均印五千至六千份。然而在初期我们的日报遭到了批评，现在它才得到同情。北京、湖北、广州和上海等地也出版了周刊。

关于京汉铁路罢工事件，我们出版了小册子，在很多场合，我们发表了宣言。《新青年》杂志以前每月出版一次，现在改为三个月出版一次。出版《前锋》月刊，刊登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一般性的文章和国际政治形势问题的文章。

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东方民族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

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

关于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决定的“民权”运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争取民权同盟”。在北京，参加这些新团体的大部分是学生，在山东和广州，大部分是工人。

我们始终反对军阀的。有个时期，我们忙于组织京汉铁路员工，要与“交通系”作斗争，而吴佩孚也反对“交通系”，那时我们没有反对吴佩孚。但是从罢工时起，我们就猛烈地反对了吴佩孚。然而，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这是不恰当的。

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党员应该更加注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现在我谈谈工会的宣传工作。先从上海谈起，上海的工业最发达和最先进。可是那里的工人组织却很落后，开展运动很费力。有很多工人组织，可它们只是空有其名。我们与一个不大的五金工人小组有联系。国民党与海员和制烟工人有联系。我们对于上海应该更加注意。

在北方的铁路员工中，我们在京汉线上有较好的组织，可是在罢工期间被破坏了。津浦路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实际上并不存在。京奉路的组织是秘密的。津浦路上的工人还严重地分成各个同乡会。京奉路上至今还很难把不同部门的工人联合起来。

湖南、湖北和广东的联合会与我们有联系。湖北的炼铁、制烟和纺织等产业部门的工会，以及人力车夫组织，也与我们有联系。汉阳工会很有希望，是中国最大的工会，可以作为榜样。萍乡矿工工会在二月罢工中受到了损失，但组织仍然保存下来了。

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加入这个联合会的还有萍乡的矿工。粤汉路的组织也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其余的组织是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广东的大部分工人工会是手工业工人工会。建筑工人的组织也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我们党的女党员只有十三人。中国的妇女运动还很不发展。我们对广州和湖北的“女权联合会”有一些影响。北京和上海也有这种联合会。

现在我想就我们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抱着革命感情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

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现在我们在工人中只能提出成立中国总工会的口号，而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还应当工人在中进行拥护国民革命的宣传。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呆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

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现在我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邓同志在唐山和科乌^[2]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广州造成了很多困难。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俄文稿

注释：

[1] 此处俄文稿为“ежедневник”（日报），德文稿为“Die Woechentliche Ecitung der Partei”（党的周报）。

[2] 音译，俄文为“Кой”。

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1]

（一九二三年六月）

一、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的结果，乃产生帝国主义；把殖民地变做他经济机体的附庸，就是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中国旧时的宗法社会，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割地赔款，强辟商埠，接受外债等，——就开始崩坏。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权、

协定关税等等优越的权利，他们便支配了中国重要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

二、中国之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及其性质

外货之输入，虽然使中国的手工业生产适应了他而渐渐趋向集中，但是外国大资本生产产品之占领中国市场，几乎同时断绝了中国的大工业发展之可能；原料之输出，虽然使特种农产品的收集和流通渐渐进到了新式的组织，但这样便紊乱了中国旧时经济基础之宗法社会的农业。因为这个原故，中国国内国外的商业便独作偏畸的发展，基本农业的生产力一天一天退步，工业被外力阻住不得正当发展，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等小生产者渐渐失掉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失地的农民，他们人数之众多和失业失地之迅速，比起国内工厂等新式生产机关的发展来，不知要超过若干倍，这些新式生产机关自然容不了他们。

这种经济的大变动，只有极少数的官僚和极少数的大商人（财阀）趁火打劫得了些便宜；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和大多数的劳动平民便一天一天失掉了他们生活的保证，他们遭受贱价劳力的剧烈竞争，他们遭受一切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使他们无法生活。商业经济的市场越开展，外货之输入、原料之输出越增多，而同时生产方法之改进甚少，宗法社会崩坏之过程因而甚缓。而且国家在对内对外的新环境内，令政府不得不滥征各种苛税，故生产事业更因之而毁坏日甚。

三、现代中国的政治现象

失业的人越多，极幼稚极少数的工业生产越不能收容，兵和匪就越多。中国最初因为要抵抗列强而采用近代的军事技术，添设“新军”这本不是积弱的中国所能担负，尤其不是宗法式的皇帝所能驾驭；而且中国旧时的经济生活极其散漫，并没有成为一个集中的经济区域，这些散漫的半独立的区域，到处都能够将财阀的经济力去供给军事长官或土匪，使他们都有所凭借；因此就造成了军阀统治的政治形势。中国军阀之存在及发展，又大有赖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便不惜向列强低首，甘心做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各军阀有此种种凭借，便互争雄长，引起不断的内乱；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谋利用中国一派军阀，相互争夺其势力范围，又酿成了无穷的冲突。军阀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日趋剧烈，中国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争斗也日趋紧迫，不但如此，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稍为有一点发展，劳资的争斗也就稍为有了一点萌芽。

这种种争斗的表现，到欧战以后就更发显著了。

四、欧战后中国社会中各种争斗的形势

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自尽量发展，而又相互攘夺，因此酿成欧战，结果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但在各殖民地却恰好趁此机会勉强地发展了他们的工业；一面世界的社会革命时期从此开始，打断帝国主义战争的横流，许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做许多殖民地革命之自然联盟者。中国系处于“国际殖民地”的地位，欧战以前列强在华虽然互相恶斗，但尚能勉强维持其均势，中国的政权也就因为这个均势尚能勉强保存于本国军阀之手；固然亦因此而中国在欧战中之经济发展仍是横受各方牵制，并未能有长足的进步，然在这一期中国工业极小的发展

中，毕竟露出了少数的无产阶级，渐渐可以加入世界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因防御社会革命而力求恢复资本主义的威权，更竭尽全力来侵略中国这一个唯一的“自由”市场，其侵略方法，愈进于攫取财政权及移植资本之倾向，愈要勾结军阀煽动内乱；于是辗转相因，使“游民化”、“兵匪化”更成为中国之普遍的经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的势力自然不免涣散。况且中国经济生活中骤起骤落的危机，无一不受正在崩坏的世界资本主义之影响——列强大资本生产品之倾轧，原料之垄断，机器购买之限制以及关税金融之操纵都使幼稚的中国工业发展受莫大的障碍。再则欧战后列强间的均势时有破裂之虞，已屡屡引起其代理人（军阀）中间的战争；其经济上政治上的冲突更将引起太平洋上的世界大战。因此种种，可以证明中国之经济力，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之下，永无独立及充分发展之可能，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自然亦极难发展集中其争斗力。因此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民族民主的总争斗就日趋激烈，日益迫切。

五、中国之国民革命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革命中所占的地位

中国处于现时这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不能充分发展，因之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充分发展，阶级分化不充分的全国人民，皆受制在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之下，不能不要求经济发展而行向国民革命，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的阶级，多为列强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有些还因在宗法社会的陷阱里。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六、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

此时中国重要的工业机关，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农民正面的敌人，更是列强与军阀官僚，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尽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还应当努力扫除宗法社会的余毒，以增加国民革命运动进行之速度。

七、中国无产阶级之争斗及其最终目的

中国民族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革命，在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不期而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战线相联合，故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此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宗法社会的国民革命，其意义实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斗。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军阀根本上不能不冲突；而劳动平民及无产阶级的解放，尤其与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根本上不相容：国民革命之进行，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所以中国无产阶级更当参加此种国民革命，以先锻炼集中其能力而取得政治争斗中的位置，方能于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努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